

## 土田健次郎，《江戸の朱子学》

東京：筑摩書房，2014年。256頁。

郭雨穎\*

近世東亞思想世界，朱子學的影響十分巨大，如明清中國以朱子學為官學、朝鮮王朝以朱子學立國等，均是顯例。相較之下，在江戶幕府治下的日本，朱子學的發展則顯得複雜。在先行研究中，以丸山真男的觀點較具代表性，他認為日本得以具備「近代化」的思維，是原本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朱子學，自江戶中期開始遭到古學、國學連番挑戰的結果。<sup>1</sup>丸山真男的論點顯然有其後設視角，也衍生無法自圓其說的矛盾，因為儒學本不植根於日本心靈，且江戶時代乃是武士社會，與外來的知識體系本就扞格不入。是故，早稻田大學教授土田健次郎轉而探掘朱子學的「機能性」，重新審視此一思想體系在江戶日本的境遇與發展，並側重留意朱子學的影響力，進而撰成本書，嘗試修正丸山真男對朱子學的偏頗定位。土田健次郎以宋明理學研究見長，他長期關注儒學在近世東亞世界的流布，曾著有《道学の形成》、《儒教入門》、《「日常」の回復——江戸儒学の「仁」の思想に学ぶ》、《朱熹の思想体系》，並編著有《近世儒学研究の方法と課題》等書。

本書共分十章，架構看似不相統屬，但可概分為四大面向，分別是「對丸山真男思想史觀的回應」、「朱子學的機能性」、「朱子學與反朱子學」及「朱子學與日本近代化」。以下就此展開評述。

---

\*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專任研究助理

<sup>1</sup> 丸山真男，《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》（東京：東京大學出版會，1972），第2、3章，頁3-320。

## 一、對丸山真男思想史觀的回應

自丸山真男《日本政治思想史》成書以來，其獨到見解至今仍影響學界對江戶思想史的詮釋。他所擘劃的「朱子學→素行・仁齋學→徂徠學→宣長學」思想史觀，旨在強調日本的近代思維其實蘊藏於江戶時代，而此種近代性的形成與展開，係通過荻生徂徠「作為」（する）的秩序思想，展開對朱子學「自然」（である）秩序、價值的肢解，進而切斷其連續性思維。<sup>2</sup>據此，對丸山真男而言，江戶思想史其實就是一部解構朱子學的歷史。

但在土田健次郎看來，丸山真男根本是誤解了荻生徂徠。他在第四章〈丸山真男の朱子学観〉中指出，荻生徂徠是爲了形塑自我學問體系，故才以伊藤仁齋、朱子爲假想敵，批判他們的思想；然而，此種批判卻被丸山真男誤解爲思想史發展的整體脈動。此外，他又在第五章〈朱子学がもたらしたもの〉指出，丸山真男以「自然」、「規範」來區別朱子思想中的「所以然之故」和「所當然之則」，並將兩者視作混合爲一的連續性思維，實爲對朱子學的誤解。土田健次郎分別以「存在」、「當爲」與「所以然之故」、「所當然之則」進行對比，指出朱子乃是先區別出「存在」與「當爲」的不同含意，而後才將兩者統合爲一。

## 二、朱子學的機能性

丸山真男以朱子學作爲江戶幕府的統治意識形態的種種預設，固然別出心裁，但此一解構視角難以闡明朱子學在江戶日本的發展。相對於此，土田健次郎試圖挖掘朱子學的「機能性」，藉以釐清它在江戶時代發展的境況。蓋江戶初期朱子學的發展，儒者首重與佛教進行鑑別，認爲講求獨立於釋道之外的發展，係由於佛教長期佔據思想世界的緣故。除了對倫理綱常的重視外，儒者亦

<sup>2</sup> 丸山真男，〈「である」ことと「する」こと〉，《日本の思想》（東京：岩波書店，2013），頁 158-160。

確立新的修養論，如山崎闇齋提拈出朱子學的「居敬」。據此，土田健次郎認為，中世以來佛教風氣興盛，江戶初期的儒學雖與佛教同樣關注心性論的攝取，但更強調修養與實踐，此一轉向可視為新思想的開端。而從構造論到修養論的轉化，則可看作朱子學在江戶初期所發揮的作用。另一方面，從政治場域出發，須將朱子學置於武士政權下來進行思考。即便儒學本非武士思想的根源，但在如荻生徂徠所謂「文武兩道」的倡行之下，儒學確實有助於武士社會「倫理性」之建構。

土田健次郎接著指出，即使朱子學並未成為官方意識形態，但它所帶來的基礎教化卻深深影響江戶日本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是「正統論」與「鬼神論」。前者主張效忠統治天下之王者，但在江戶時代統治的重層結構下，面臨朝廷、幕府與藩的位階序列，此一原則仍有所調整，結果形成以天皇承繼秩序為首要的「皇統論」。「皇統論」講求天皇「道統」與「正統」合一，再加上萬世不易的連續性，已非「正統論」的本來面目。儘管「皇統論」範疇下的「正統」觀並非完全挪用自朱子學，但朱子學脈絡下的「正統」概念仍然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江戶時代的武士、儒者，於幕末崛興的「尊王攘夷」思想，即是例證。

再就「鬼神論」來說，土田健次郎以神道與朱子學的結合為例來加以檢視，認為最能體現這種思維的儒者，即是山崎闇齋及其門派。自中世晚期以來，神道家即漸次吸納朱子學理氣論，藉以夯實自身思想體系，但他們對朱子學往往缺乏深刻體認，直到山崎闇齋脫佛入儒回歸朱子學，又在晚年崇信神道，才在兩大思想體系中找到相互會通的可能。首先，由於日本思想的特色在於對形上層面「理」的抵抗，故山崎闇齋講求神儒「妙契」，擘劃的是「心」（朱子學）與「神」（神道）對應的思想系譜，在「修養論」方面，將朱子學的「居敬」對應到神道教義下的「祓」（つつしみ）。其次，在「祭祀論」方面，如山崎闇齋弟子三宅尚齋即繼承中國儒家「父子一氣」的祭祀概念，以此闡說與先祖的連結，同時亦以「神主」的有無來與佛教葬禮相區別。據此，可以將山崎闇齋學派的思想，視作朱子學在日本的展開。

### 三、朱子學與反朱子學

與神道結合之朱子學固然深具日本色彩，但論及儒學在日本的「土著化」，土田健次郎認為以伊藤仁齋最具代表性。伊藤仁齋雖然批判、解構朱子學，但土田健次郎指出：不論是肯定或反對朱子學，各學派多仍是以朱子學的問題意識與思想表現為共同資源，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建構己身的學問體系。

伊藤仁齋雖主張一元氣的「生生」之道，但側重在人道的日用倫常，進而將「理」指為死字，但這並不表示他否定「理」的存在，其意在於反對朱子將「理」區分為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。他深忌將天地之性引入人道，但將「性」限縮在「氣質之性」的思考，其實也是借用了朱子學的概念。土田健次郎指出，伊藤仁齋反朱子學的立場，與堅守朱子學的山崎闇齋學派恰成對比，該學派中又以淺見綱齋對伊藤仁齋的批判最為激烈，尤其是在方法論方面（如伊藤仁齋解讀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的「血脈」）。儘管如此，山崎闇齋與伊藤仁齋的終極關懷，均是欲將儒家修養論落實於人倫日用中，使儒學能夠更加貼近日本人的日常感知。

另一方面，通過廣瀨淡窓《儒林評》所揭示江戶時代儒學發展的三個階段，<sup>3</sup>土田健次郎重申朱子學「機能性」的重要。他指出，繼伊藤仁齋而起的荻生徂徠側重在「禮樂刑政」的基礎上闡述「先王之道」，在禮與法的交織下，別有一番風景。但徂徠學所引發的思潮，也間接促使儒者復歸朱子學，於是有了「寬政異學之禁」的頒行。可以說，在認識徂徠學時，其實也是從反朱子學的對立視角重新認識了朱子學。原因在於，反朱子學的儒者，如伊藤仁齋、荻生徂徠甚或陽明學者等，其實也共享了朱子學的思想體系和語言範疇。

---

<sup>3</sup> 廣瀨淡窓，《儒林評》，收入田郡教育會編，《增補淡窓全集》中卷（京都：思文閣，1971），頁 1-2。

## 四、朱子學與日本近代化

土田健次郎在第十章〈朱子学と近代化〉進一步指出，朱子學與反朱子學的並行發展與頡頏、學派間彼此的對話與交流，才是日本得以在幕末時期吸納西方新進思想，邁向「近代」的關鍵。土田健次郎指出，信守朱子學的儒者嘗試以「理」、「氣」、「格物致知」等基本教理鎔鑄西學，而古學儒者——尤其是荻生徂徠對朱子學展開解構，揭櫫經世之學的重要性，其所引發的「實學」思潮也確實起了「觸媒」作用，加速對西學的吸收，如同時融攝朱子學與徂徠學的思想家西周便是一例。

另一方面，相較於朱子學者、徂徠學者著重對學問的耕耘，訴諸行動的陽明學者，由於抗拒對心外之理的攝取，遂與西方的自然科學、政治思想等知識無緣。據此，土田健次郎認為，日本之所以能「近代化」，關鍵乃在於幕末諸多學派均是以朱子學的思想體系為基礎，來吸取西方的近代思想，重構西學知識，進而敦促日本於自身的知識體系中發掘「近代化」的可能性。此一論點意在指出：朱子學並非如丸山真男所認為的，作為江戶幕府體制意識形態，遭反朱子學挑戰、解構後，才促使日本「近代化」。土田健次郎認為，必須正視到江戶時代的思想本是沉浸於朱子學中，尤其朱子學在知識體系中具有潛移默化的作用，故此，他再三強調朱子學「機能性」的重要。

本書試圖重新衡定朱子學對江戶社會、思想世界的影響力度，土田健次郎的江戶思想史觀，基本上可以視為對丸山真男思想史觀的回應與修正。從學術史脈絡來看，他與同樣嘗試修正丸山真男觀點的渡邊浩、黑住真等學者，顯然仍有所區別。渡邊浩直截了當地指出，即便江戶時代關心儒教的人開始增多，宋學（朱子學）的信仰者亦開始增加，但以儒學為志業的人仍舊是少數，因而朱子學作為維持江戶幕府統治的意識形態這一說法，簡直無法想像。<sup>4</sup>黑住真

---

<sup>4</sup> 渡邊浩，〈徳川前期における宋学の位置〉，收入氏著，《近世日本社会と宋学》（東京：東京大學出版會，1985），頁16。

也認為，朱子學在江戶幕府治下根本沒有成為官方意識形態，原因在於儒學無法侵蝕原有的宗教（佛教）與信仰體系（神道），且江戶時代並無科舉制度，儒學自然無法扮演知識生產的要角。<sup>5</sup>他們兩人均認為朱子學對江戶社會的影響著實有限。

然而，土田健次郎所欲強調的是，江戶武士社會標榜「尚武」、「文武兩道」，作為「文」（知識）之代表的儒學，影響固然有限，但朱子學作為武士社會倫理（忠、孝）與建構政治秩序（正統論、皇統論）的思想資源，<sup>6</sup>其地位不容否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土田健次郎雖然承認朱子學係通過典籍流傳進入日本，但他認為朱子學並非僅是從中國「渡來」的思想，而更是從日本中世以來傳授儒學的博士家以及室町禪僧中獲得解放，通過吸收儒家思想來確立新的修養論與倫理觀念，才得以獨立於佛教之外，成為江戶思想世界的啓蒙能量。可惜的是，土田健次郎對江戶朱子學修養論與倫理觀念的探討，並沒有在他此前對朱子學於近世東亞世界變遷情形的論述基礎上，展開更進一步的探討。<sup>7</sup>

此外，必須指出的是，本書著眼於江戶朱子學「機能性」的探討，但同時也捲入了戰後日本學界有關江戶思想史「日本化」、「土著化」與「近代化」等研究視角的糾葛。誠如澤井啓一所言，丸山眞男對江戶思想史的探索，所欲解決的問題主要有二：其一為儒學的「近代化」，源頭溯自荻生徂徠；其二則是儒學的「日本化」、「土著化」，以山崎闇齋為代表。<sup>8</sup>相較之下，本書欲證成江戶朱子學的「機能性」，在「日本化」、「土著化」的論述上，主要側重嚴守朱子學的山崎闇齋及其門派。另外，本書亦嘗試在反朱子學的儒者當中找到儒學「日本化」的可能性，如指出伊藤仁齋致力解構朱子學形上層面的

<sup>5</sup> 可見黑住眞，〈日本儒学の制度と性格〉、〈日本思想史と儒教〉兩文，均收入氏著，《複數性の日本思想》（東京：ペリかん社，2006），頁 232-268。

<sup>6</sup> 土田健次郎，〈朱子学の正統論・道統論と日本への展開〉，收入吾妻重二、黃俊傑編，《東アジア世界と儒教》（東京：東方書店，2005），頁 285-307。

<sup>7</sup> 土田健次郎，《儒教入門》（東京：東京大學出版會，2011），第 8 章，〈儒教の地域的・時代的変容〉，頁 169-189。

<sup>8</sup> 澤井啓一，〈丸山眞男と近世 / 日本 / 思想史研究〉，收入大隅和雄、平石直昭編，《思想史家丸山眞男論》（東京：ペリかん社，2002），頁 174-175。

「理」，是爲了使儒學「土著化」，進而使道德情感可以落實在人倫日用之間，其所朗現的思想特質便是儒學思想中的「日常性」，<sup>9</sup>從而體證江戶時代儒學「日本化」、「土著化」的特色，主要在於對形上思想的抵抗。

綜觀全書，土田健次郎試圖探討朱子學此一思想體系在江戶社會的「機能性」，不但視域開闊，亦能觸及反朱子學議題，同時亦從江戶朱子學的發展情形歸結研究方法論，如「類型的共有」：江戶儒者多意識到儒教（朱子學）禮制可作為安定社會的重要秩序、價值觀，以及「內容的分歧」：因其地域文化不同而對朱子學典籍、禮制開展不同的詮釋或演繹。據此，他認為東亞諸國儒者因風俗環境不同，對於朱子學禮制也面臨不同的適應問題。土田健次郎指出，與其將江戶朱子學／反朱子學的形成，看作是朱子學的「超越性」，不如說是朱子學在不同文化地域的影響所產生的「自覺性」。<sup>10</sup>可以說，本書除了關注江戶朱子學的「機能性」，其思想視域亦可提供我們對近世中國朱子學（明、清），乃至東亞朱子學（朝鮮王朝、越南）研究的借鑑與反思，從各個不同的文化區域來重新探究朱子學的傳播情形。

<sup>9</sup> 土田健次郎，〈伊藤仁齋の達成——日本の日常の思想としての「仁」〉，《「日常」の回復——江戸儒学の「仁」の思想に学ぶ》（東京：早稻田大學出版部，2012），頁 47-48。

<sup>10</sup> 土田健次郎揭櫫朱子學「機能性」影響所及，進而引發江戶日本（乃至近世東亞世界）「自覺性」、「自覺化」的概念，主要係從加地伸行的《沈黙の宗教——儒教》（東京：筑摩書房，1994）轉借而來。且根據土田健次郎的定義，江戶日本「自覺化的儒教」又可區分為兩大派別，分別為接受朱子學最爲嚴格且徹底的山崎闇齋學派（崎門學派），以及高舉反朱子學大森の伊藤仁齋學派（古義學派，亦稱堀川學派）。詳參氏著，〈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朱子学の機能——普遍性と地域性〉，收入早稻田大学アジア地域文化エンハンシング研究センター編，《アジア地域文化学の構築——21世紀 COE プログラム研究集成》（東京：雄山閣，2006），頁 218-236。